

世俗化与媚俗化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特征分析

司新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通过抒写世俗的内容、体现世俗的价值、反映世俗的精神体现出题材的世俗化特征。现代通俗小说从产生起就是与文化市场密不可分的商品文学, 即迎合一般大众的趣味和价值观念, 创作态度是媚俗的, 作品存在形式也呈现出媚俗化特征。文学所具有的崇高的悲剧精神、启蒙精神以及自我超越的反思精神都消失在感官的消遣娱乐中。

【关键词】 世俗化; 媚俗化; 存在形式; 消遣娱乐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章编号】** 1002-3054(2016)02-0064-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kxy.bjshkx.160209

一、引言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以市民大众为精神主体、以大众的娱乐和消遣为创作目标的商品文学。黄永林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通俗文化兴起时提出这样的观点: “在通俗文学中, 以认同世俗, 向世俗靠拢为最高和惟一目标, 从世俗理性出发, 他们把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 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他们的思维往往是实用的、经济的。”^[1](P89)] 这同样适用于“五四”以后到 1949 年间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注重世俗和现世生活。“乐天知命”“知足常乐”常常成为生活的座右铭, 在文学领域尤其是在小说中常表现为世俗性和日常性以及其中多姿多彩、深刻动人的人性、人情世界, 通俗小说最有代表性。

二、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特征

1. 小说题材世俗化

通俗小说是面向世俗社会, 反映世俗的审美

和伦理观念, 并以此为特征为市民读者服务的一种文学样式。阅读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对普通市民读者来说, 就像看电影、电视剧、听流行歌曲一样能带来快乐和放松, 达到消遣娱乐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只有通过有趣的故事, 即世俗化的小说题材。

所谓“世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 是指与宗教的天国、彼岸、神圣等意义相对的现世生活, 包括如儒家的制礼作乐、安邦安国, 也包括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而狭义的世俗, 则特指脱离了形而上的精神性的追求, 只以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欲望为价值标准的生活及精神状态。”^[2](P523)]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题材的世俗化是通过抒写世俗的内容、体现世俗的价值、反映世俗的精神体现出来的。一方面,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题材始终与世俗紧密相联, 描述大众的日常生活现实和情感; 另一方面, 作者创作的价值理念也往往认同世俗理性的价值观, 不同于中国现代严肃小说有高尚的理想主义追求。此外,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家在给读者营造梦幻世界的同时, 努力使其小说贴近市民生活, 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

【收稿日期】 2015-11-16

【作者简介】 司新丽 (1970-), 女, 山东淄博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4YJA751022)

们的喜、怒、哀、乐，书写世俗人生中的传奇故事，通过书写传奇故事来反映世俗的精神。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题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社会言情小说为代表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取材于世俗社会，叙述市民的世俗生活和情感，能够满足读者消遣娱乐的审美心理。市民读者希望自己熟悉的人物、日常生活及心理能够在小说中有所反映，使其在作品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二是以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为代表反映非现实的题材，表达的却是世俗价值和世俗精神。市民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自己不能完成的或无法达到的愿望，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所写非现实题材往往能满足读者的情绪需要或情感寄托，使读者暂时逃避现实，完成情绪的宣泄而获得情感满足，到达消遣娱乐之目的。

(1) 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社会言情小说。清末民初言情通俗小说以哀情小说为主，大都属于家庭伦理小说，故事离奇曲折，大都围绕家庭伦理、封建礼教展开，哀情发生源自小说主人公对封建礼教的自我遵守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小说主人公面对矛盾和冲突时表现出“发乎情，止乎礼”的态度和行为，在极端痛苦中抉择礼教，其实这是对社会现实的认同，无疑符合世俗的审美心理。《玉梨魂》中的白梨影、《孽冤镜》中的王可青和《贾玉怨》中的史霞卿等都是如此。就读者角度而言，小说中人物对封建礼教的抉择符合当时市民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但读者的本能对美好爱情有所渴望和追求，因此小说的悲剧结局某种程度满足了读者的心理和情感需求，现实生活的心里情结也能够得以舒缓，能够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正是因为小说题材具有世俗化的特征。清末民初市场文化的迅速发展，市民身上既有浓厚的传统思想烙印，又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变化提供给通俗小说以鲜活的题材，通俗小说真实记录了都市化的演变过程及市民不同的心态，就此而言，小说所选取的题材必然具有世俗化的特征。

“五四”后的社会言情小说运用的题材由传奇性转向生活化和平民化，向读者展示了新市民的生活现实和世俗情感。比如张恨水小说总是把男女感情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特别注

意从经济角度观察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正如朱静一所言：“张恨水以其平实的世俗意识，清醒而深刻地指出了婚姻恋爱中世俗基础的重要性，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脱离开具体的经济生活而谈爱情，人物的恋爱和两性关系，都是紧密地和世俗意义上的生存问题结合在一起的。”^[3]《啼笑因缘》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几乎是当时市民的生活缩影，主人公沈凤喜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人物，樊家树和沈凤喜的恋爱因金钱纠葛变成一个充满了琐碎的世俗化过程。再比如张爱玲的小说通过写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情感，为读者打开了审视沦陷前后上海和香港中上层社会病态的、不健全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生活和心态的窗口。在平常家庭中的有质有感、平凡琐碎的日常人生，写这种世俗的悲欢喜乐。张爱玲小说的故事写的依旧是世俗的内容，小说中的人物尽管传奇，传奇的人物有人性和兽性相交的一面，但其奋斗目标或最终目的指向了世俗，依旧显示出了世俗的人性。苏青的《结婚十年》写世俗之人、世俗之情、世俗之事、世俗之趣。苏青小说题材的世俗性集中体现在作者把人物和故事放到世俗的日常生活形态中，从世俗的角度考察和表现两性关系。

总之，社会言情小说所提供的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情感题材都是人类在实际生活中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的，不同于“五四”主流文学体现的与个性解放和启蒙等现代理性精神紧密相联的爱情。

(2) 反映非现实题材的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以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为代表的反映非现实的题材，同样体现了世俗的价值、反映了世俗的精神，满足了市民读者消遣娱乐的审美心理需求。这些世俗化非现实题材辐射到各个阶层的社会人群，无论他是怎样的社会地位，怎样的人生经历，都能从中得到阅读快感，从而完成消遣娱乐的过程。武侠小说的故事无非是武林之间的争夺霸权或抢夺宝物或仇杀等，侦探小说的故事无非是要找到扑朔迷离的案件发生的真实原因。这些故事都与人的争强好胜、正义感、好奇心以及对爱情的向往等世俗天性有关，所叙述的侠客生活和侦探生活都是非现实、非常规的，是传奇。但当传奇成为作者笔下的故事传达给读者时，就

变成了一种世俗价值和精神的传达。

武侠小说的产生与市民读者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和内心的渴望密切相关。心理学认为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不能完成或无法完成的心愿总是用相类似的事情去替换,从而获得一种心理满足。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中武侠故事对读者则有这样的作用,使读者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对正义和力量的渴望得到满足。读者对武侠小说的热爱不仅反映了生活在动乱环境中的市民“逃避现实”“自我麻醉”等消遣娱乐的心理,而且也反映了从有文化以来,人类就已经具有的形而上追求的内在精神需要。无论是侠文化本身还是武侠小说运用的题材都具有世俗性。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满足读者的心理欲望,就在于小说所塑造的具有高强武艺、肝胆侠义、扶弱济贫的侠士,使读者本能欲望以及对侠义精神的渴盼心理得以满足。武侠小说虽然没有反映直接的世俗生活,但它所宣扬的精神符合世俗大众的价值判断以及被世俗所接受的传统人文精神。总之,武侠小说体现的侠义精神因为能够体现世俗价值和世俗精神而被市民读者所接受。

侦探小说虽然情节很离奇,但相比武侠小说更贴近生活现实,其题材多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读者在小说中能够感受到伴随在自己周围的危险、自己的敌人和保护自己的人。小说所塑造的大侦探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比如程小青笔下的霍桑就是一个非现实存在的人物,他蔑视权贵、同情弱小、聪明智慧,他是一个侦破英雄,他让读者对生活的想象得以宣泄,特别是他那充满智慧的逻辑推理能够使读者得到快感,读者自身的智慧也能够替代补偿。侦探小说彰显正义之气必将战胜邪恶之气,故事建立在严密的推理和科学的逻辑之上,这些都符合世俗文化和世俗接受心理。弘扬正义、同情弱小、劫富济贫等在侦探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世俗观念,都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等世俗理性的一部分。侦探小说中多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结局,同样符合读者的世俗观念和世俗价值判断标准。另外,侦探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平民意识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小说题材的世俗化。比如,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明确显示了作者的平民意识,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同情,使小说选

取的题材符合世俗价值的判断标准。孙了红的侦探小说同样贯穿了一种平民意识。孙了红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人格趋向平民化,揭示了与世俗人情更接近、更能被读者所接受的世俗人物关系,同时小说中多数人物的塑造往往趋向低层次社会地位的选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可以和世俗日常生活交融的人和人之间的氛围和场景,充满了世俗气象。其实,侦探小说“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就是被市民读者接受的世俗化过程。

2. 小说存在形式媚俗化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从产生起就与文化市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注定了其具有商业性特征。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创作态度是媚俗的,即迎合一般大众的趣味和价值观念,为了获取大众的欢心而在意感官的刺激与猎奇,这决定了作品存在形式的媚俗化。

什么是“媚俗”?“媚俗”一词,来自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著名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西方的语境中,一般用一个德语名词“KitSch”来表示媚俗的美学趣味,这个词最初指与传统艺术不同的廉价艺术品或者艺术品的坏趣味。昆德拉在1985年颁奖典礼上作演讲时进一步解释了媚俗,他说:“‘媚俗’一词描述了这样一些人的态度:他们不择手段地试图向绝大多数人讨好卖乖。要讨好卖乖,就得进一步确认人们喜欢听些什么,就得全心全意为流行观念服务。‘媚俗’就是把流行观念的愚昧翻译成美丽而富于感情的语言。它煽动我们,直至我们为自己、为我们所思所感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流下同情的热泪。”^[4]昆德拉的“媚俗”指的是为了达到美化和提升的欲求而做出的用假象掩盖真相、自欺欺人的心理倾向和实践行为。1987年韩少功在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将之译为“媚俗”。媚俗一词被广泛使用,主要是建立在米兰·昆德拉的理解基础上,并适当综合了汉语的意义。金红认为:“媚俗针对文学潮流,是一种迎合或趋向世俗、粗俗甚至庸俗、鄙俗等文化状态而展示出的主观性行为。”^[5]张腾云认为:“‘媚俗’一词指不惜一切代价讨好,而且讨好最大多数人的一种态度。”^[6]雷洪梅从汉语词源涵义及其运用语境方面认为:“媚俗的汉语

起源相对于西方词源来说显得单一得多，主要是指艺术创作中一种态度，即取悦于世俗或者是俗人的一种态度。”^[7]20世纪80年代后媚俗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名词，这是因为80年代从思想的传播、观念的转变到生活态度和方式的变化都肯定了世俗生活和世俗欲望，艺术发展走向生产、走向市场，进而走向消费，最终走向了媚俗。由此可以得出：小说的媚俗与市场、与读者阅读期待有直接关系。

方玲玲认为：“市场和商家是媚俗的始作俑者，但他们充其量只是策划者，真正将这一文化现象推向波峰的，离不开两大主体，即创作主体和受众主体。”^[8]市场机制控制了文学创作，读者构成市场的重要部分，小说创作关注的点就是读者，读者意识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文学市场的升沉起伏，读者的阅读兴趣成为文学市场上的经济杠杆，因此文学出现了媚俗倾向。从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到“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存在方式都具有媚俗性，作品的存在形式包括作品的表达方式和包装方式。

(1) 表达方式的媚俗倾向。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向读者传达的是一个传奇故事，读者对这些故事感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这些故事材料进行整合的艺术手法具有媚俗性特征。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家主体思维的高度都没有超越一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而且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表达方式通常能够适应市民的欣赏观念和习惯，叙事方面运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讲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叙事模式化，比如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不同程度上遵循一个模式，在某一模式中显示出对故事的独特构思；语言方面，大多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反映市民大众感兴趣的事情。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叙述形式虽流于模式化，但这种模式化的表达方式暗合了市民读者的阅读接受心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善于制造叙述内容上的陌生化效果，即故事要出奇制胜，情节要别出心裁。不论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还是侦探小说，所选取的题材不同于常规的现实生活，总带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色彩，更近似于传奇，但是给读者呈现这些题材所用的方式确是常规的，媚俗的。中国现代通俗小

说的表达方式往往是以偶然作为故事的开端，中间叙述的是极尽曲折的故事，最后以悲壮或凄凉作为结局。这种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甚至是粗制滥调，却依然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汤哲声认为：“原因就在于故事的表述思维与读者的接受思维相一致，与读者的审美期待相一致。……法宝就是它的情节思维与读者的阅读思维的一致性。”^[9]对传奇故事的构造暗合市民读者的阅读期待成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媚俗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既继承传统文学的表达手法，又吸收新文学和外国小说的表现技巧，迎合读者的心理需求，表达了媚俗心理。为了迎合读者，与读者直接对话，通俗小说作者在体裁等艺术表达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清末民初一些有影响的通俗小说家的作品都采用过“报纸连载”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会从外在形式上中断曲折紧张的情节，容易给读者制造悬念，吸引读者，调动读者的参与和想象。此外还有新花样，比如“集锦小说”“悬赏小说”“别裁小小说”等等，其中有不少花样是纯粹的游戏方式，作品本身在此游戏中似乎是一种道具，这样能够调动读者参与的积极性。总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呈现出来的种种方式，使读者与作者互换位置，直接参与创造，博得读者的青睐和欣赏，媚俗性显而易见。

(2) 包装方式的媚俗倾向。通俗小说的包装手段之一就是文学期刊的编排。市场文化的领域中，读者首先接受或感受到的是作品存在的载体——期刊，期刊的设计风格首先会对读者产生强烈的感官刺激，而承载通俗小说的期刊设计即媚俗化的栏目设计对通俗小说的发行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的一批文学刊物，都缺乏真正的栏目意识。从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起，出现了固定栏目，但是这些栏目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更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从1909年10月《小说时报》创刊起，刊物纸型由32开变成了16开，刊载的小说篇幅加长，栏目设置也是大而全，栏目中小说被分为长篇和短篇，这种改变加快了读者的阅读速度和节奏，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状态。1914年6月创刊的《礼拜六》杂志，特点小而简单，纸型32开，页数减少，小说多为短篇，这样篇幅

的小说,更适合读者在礼拜六得到消遣娱乐的感觉。特别是1921年复刊后的《礼拜六》杂志更加精致化。总之,通俗小说载体报刊杂志媚俗化编排形式更多是从方便读者消遣娱乐的角度考虑,此种编排形式读者从心理上更能接受。《紫罗兰》杂志于1925年12月创刊,最终把编排的媚俗化推向高峰。文学期刊的编排的逐渐精致化,体现了通俗小说包装的媚俗化。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杂志基本采用了精致化的形制,这是市场文化的作用,也是媚俗化的力量。1941年7月创刊的《万象》是40年代影响最大的杂志之一,虽然又逐渐走向大型化,但成功之处在于杂志内容的包罗万象。杂志的内容包含有科学知识的介绍、戏剧和电影的介绍以及家庭宴会的游乐方法,甚至学术研究的问题也成为杂志包含的内容。总之,杂志栏目编排的变化,确实体现了通俗小说载体的媚俗化。

期刊杂志中的视觉图像和文字广告同样也是一种包装的媚俗化。就视觉图像而言,一方面对文字是一种意义的补充;另一方面对读者是一种直接的感官刺激。从20世纪初开始,几乎所有的小说杂志都设置了图画栏的名称,即使连《礼拜六》这样小型的杂志虽没有图画栏,但每期杂志都有不少图画,封面是水彩仕女。《紫罗兰》每期封面都配有女郎的彩色肖像图画,几乎和艺术品相媲美。前期是妓女加名胜古迹的照片,后期是电影明星加名胜古迹的照片。《小说时报》也刊载了一些风景名胜的照片和大量妓女的照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2月创刊的《良友》,每期都是由人物照片和图画及简单的文字介绍构成,周瘦鹃曾认为《良友》“印刷的精美,图画文字的丰富,在目前中国的无数出版物中,确可以独树一帜”。^[10]图像意味着“更加密集的视觉冲击、更加丰富的视觉组合、更加刺激的感官享受”。^[11]这是视觉图像带给读者的最大诱惑,体现了强烈的媚俗化倾向。另外,随处可见的媚俗性商业广告不仅为刊物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刊物看起来更时髦、更现代、更吸引读者。比如《礼拜六》和《紫罗兰》中都有图文并茂的对“烟”的广告,《礼拜六》中写道:“大长城牌香烟,系用最上等国产烟叶制

成,品质之优美,气味之香纯,绝非寻常香烟所能及,君试吸此烟一支,当胜吸他烟数匣也,又每罐内,附赠奖券一纸,积存多张,可换各种贵重超时之赠品。”^[12]《紫罗兰》则用“大家同喜”作为标题,写道:“老翁吸大喜,活到九十岁”,“奶奶吸大喜,养个胖儿子”,“商人吸大喜,营业多顺利”,“小姐吸大喜,嫁个好女婿”,“老姬吸大喜,年年添孙子”。^[13]《紫罗兰》中还有对新书《男女交际学》作的广告:“男女交际的手腕怎样?男女交际的步骤怎样?见了什么女子用什么手段?在如何的地方用如何法子?本书俱能用透彻明白的诀门告诉诸位能道人所不敢道,能言人所不敢言……青年男女不可不读。”^[13]特别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期刊由工商业集团主办,期刊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期刊的广告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总之,期刊杂志中的视觉图像和文字广告都体现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存在方式的媚俗性。

三、结 语

金红认为:“世俗在文学创作中主要指文本内容重点展示的世俗化倾向。”^[5]黄永林认为:“现代大众文学的世俗精神,表现在艺术精神上一般不追求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而追求非深刻的娱乐消遣性。即淡化文学对思想性的追求,注重大众的审美需求和趣味。”^{[1](P14)}学者对世俗化的理解大致有一个共同指向:以普通市民读者的关注对象为重心,价值取向上以普通人的价值标准为目标,艺术精神上追求非深刻化的消遣娱乐。

媚俗是迎合一般市民读者的趣味和价值观念,为获取市民读者的欢心而驻足于消遣娱乐,文学所具有的崇高、悲剧精神、启蒙精神、社会责任感以及自我超越和反思精神都消失在感官的消遣娱乐中。文学不再是创造,而是变成批量生产,不能展示穿越时空的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只是一时或当下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的呈现。

世俗与媚俗泛滥的原因,在于文化市场中创作主体为了获利而大量生产作品,文学成为商品。一旦作品成为文化市场中的商品,注定了作品题材选取走向世俗化,存在方式必然有媚俗倾向,也正因此才更促进了小说的繁荣甚至是批量生产。

注释:

- [1] 黄永林. 大众视野与民间立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2] 朱德发.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 朱静一. 《言情小说啼笑因缘》中的金钱因素和世俗意识 [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7 (6).
- [4] 陈坪. “媚俗”的辨析 [J]. 粤海风, 2008 (6).
- [5] 金红. 世俗·媚俗·通俗——世纪之交文学纵横谈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
- [6] 张腾云. “媚俗”: 现代人类的一种境况 [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3).
- [7] 雷洪梅. 媚俗: 大众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考察 [J]. (硕士论文), 西南大学, 2008.
- [8] 方玲玲. 论“媚俗”及其文学体现 [J]. 山东大学, 2008.
- [9] 汤哲声.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之辨与雅俗合流 [J]. 学术月刊, 2006 (38).
- [10] 周瘦鹃. 向读者诸君说几句话 [J]. 良友, 1926 (5).
- [11] 金立群.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碎片呈现——文化、媒介的综合研究 [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6.
- [12] 礼拜六, 1923 (190).
- [13] 紫罗兰, 1929 (4).

Secularization and Vulgarization

——Chinese Modern Popular Fiction's analysis of artistic Features

SI Xin-li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 popular fiction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me's secularization by Writing the secular content, embodying the secular values, reflecting the secular spirit. Modern popular fiction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ltural market from the generation, this destined to its commer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creative attitude is Kitsch, to cater to the general public's tastes and values, this determines the vulgarization of the existence form of the works. The noble spirit of tragedy and the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and self transcendence of the spirit of reflection of literature have disappeared in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senses.

Keywords: Secularization; Vulgarization; Existing form; Recreation